

主题文章

我的宣教梦——愿华人基督徒人类学者人才辈出



连达杰牧师
(香港浸信会联会差传中心主任)

谈及我的宣教梦，或许不能不从我近年重拾书本修读“人类学”（Anthropology）说起。

在主的恩典中，从2003年至2005年间，我得以一面在牛头角浸信会牧会和在香港浸信会神学院事奉，另一面则在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以兼读方式修读“人类学文学硕士”（M.A. in Anthropology）。感谢主！很快两个学年就过去了，我亦顺利完成这个课程。接下来，主加添我的力量和信心，叫我愿意暂时放下各个事奉岗位，并于2005年8月起继续学业，用两年时间来完成另一个研究式的硕士学位，就是“人类学哲学硕士”（M. Phil. in Anthropology）。感谢主恩手带领，现今第一个学年已经完成，而暑假的“田野调查”（Fieldwork）亦刚刚结束。此刻我正着手整理手上的资料，并盼望能基于这些“文化资料”（Cultural Data），在往后的另一学年完成撰写我的毕业论文“在香港宗教环境下的族群身份认同：以九龙城潮语浸信会及其会友为例”（Ethnic Identity in a Hong Kong Religious Setting: The Kowloon City Swatow Baptist Church and Its Members）。

相信许多传道同工都想知道，为何我这位年纪并不算太年轻、牧养经验又已超过二十年的牧者，竟甘愿在人生路上作出如此巨大的改变呢？答案其实也不复杂——一切都是为了推进华人宣教工作，并且不妨从自己做起，多吸收这方面的学问和知识吧！

华人教会与人类学

既说修读“人类学”，就让我先略说人类学对宣教的好处。“宣教”是什么？“宣教”是神的子民带着使命感，把福音信息传到普世不同的族群和文化中间，并劝勉那地方的人悔改信主，从而可建立起一个有神国生命特质的“门徒群体”。基于这种理解，个人认为人类学就正好成为一门能帮助教会推动宣教事工的学问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学的本质很大程度是探讨文化及族群上的种种问题，并且更是采用一种“跨文化”的角度，可扩阔我们的视野和接触层面；是以我们就不应该错过它的应用性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及人类学与宣教的关系，大家不妨可去参阅[1]，在本文中我则不再赘言。我盼望这篇文章所分享的，较多是我的个人经历、感受和心声。

就个人所知，过去华人教会认识“人类学”不多，更遑论晓得它对福音事工的好处。然而，我相信，随着近十多年来华人教会对于普世宣教事工的积极参与和开拓，我们应当更多关注这门学科。为什么呢？或许与“宣教”意义相近的“差传”二字可给予我们一些后迪。

当我们说“华人教会一向有参与‘差传事工’”时，这句话其实表达了华人教会既有“差者”角色，也有“传者”角色。一般而言，“差者”的重点在于堂会怎样培育教会的宣教人才、并如何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去支援前线的宣教士。至于“传者”，则是强调差会及宣教士会怎样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福音战线上为基督赢得更多人，归在主的名下。二者关系密切、互相补充。惟我们必须留意一件事，就是“差者”较多是处身在“同文化”的氛围中，但“传者”就很不同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落在一种“近文化”或“异文化”的环境里，并且也需要努力跨越种种文化、族群及宗教等的障碍，才能让福音完整无缺地传扬开去。一直以来，华人教会中的“传者”多关注这“跨文化”的元素，这诚然是正确的。然退一步来说，今天“差者”也不宜忽略这一层面的理解。否则，他们怎能更体谅地与远方的“传者”同心同行，好使后者得在异地逐渐建立起主的工作呢？这样看来，帮助“差者”与“传者”同心携手去突破这些文化与族群的隔膜就是刻不容缓的事了！而“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就正好扮演着“桥梁”的角色，帮助华人教会正视此等问题，从而使教会得以带着基督的爱和福音，通往到各民各族那里去。

那么，当今华人教会已注意到这种需要吗？也许颇有不足！让我举一实例来说明。我曾阅读过一篇文章，名为“初探香港教会与内地教会交流时所出现文化差异：以香港浸信宗教会与广东省三自（乡镇）教会为例”[2]，它正是从人类学角度（即社会、文化角度）去探讨问题。它指出了，原来香港教会与内地教会在以下六方面的生活范畴是有文化差异的：（1）饮食（2）用语（3）待人（4）行政治事（5）钱财管理（6）政治；是以香港教会每当从事这类“差传”事工时，必须留意及克服种种文化及族群障碍，才能收到最大的福音果效。这种研究进路，反映着“知己知彼”的理念，实对华人教会的差传工作之推展大有帮助。可惜今天我们并不常见这类文章发表，也不习惯于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思考教会的宣教问题。我想这是今天华人教会的欠缺，也因此引发我一个期待，就是盼望将来有更多华人基督徒，投身于人类学的研究行列中，从而得到亮光，以帮助华人教会有效地推进各种宣教工作。我所说的“宣教梦”，也就是指这方面而言。

在知识上的长进

回头再说，过去三年，我在人类学的学习上获益良多，真的发现其中的知识，也可应用在差传事工这方面。举例说，我曾撰写万余字图文并茂的论文“蒙古乌兰巴托 华人社群的文化与生活——一个初步的描述与检视”，它对于一些前往蒙古短宣的弟兄姊妹有所帮助，亦因此成了他们起行前须阅读的资料。此外，我也曾参阅很多西方人类学者的研究写作，写成另一篇论文“泰北山区族群归信更正教的原因”（“**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Conversion to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of the Hill Peoples in Northern Thailand**”）。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使我深感惊讶的，就是原来有很多西方人类学者及其他各国人类学者，早就对泰北少数民族做了大量研究。我想到，今日华人教会在泰北少数民族中间也有很多宣教工作，但他们究竟有没有参考过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以促进福音事工的深化和发展呢？我又梦想一下，如果有很多华人基督徒人类学者愿意在泰北各少数民族中间生活及研究，相信他们所得的亮光和体验，定能对这地方的宣教工作带来莫大的裨益！

是的，把“人类学”应用在跨文化的处境上，是最容易突显其价值和功能；上文我已不厌其烦地多番述说。不过，人类学对教会的帮助，其实并不仅限于差传的范畴上，它对本地教会的布道和牧养工作方面，也同样会提供有用的知识和另一角度的反思。我愿意再胪列出一些我写过的论文的题目，相信大家省览后就可揣摩到我的意思：

- *“对香港‘犯太岁’观念与实践的一个概略研究”
- *“全球化及香港教会生活的文化省察”
- *“从‘文化性别’角度反思香港华人教会‘女传道’的形象、身份与角色”
- *“对青衣盐田角村客家祠堂崇拜的一些文化观察与反思”
- *“初探‘乡里族群教会’于战后迅速在香港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用心期待

总而言之，当现今世界愈来愈重视文化触觉及文化间的互动交流，而华人教会今后又愈多接触普世各地的族群和文化，我们看来就愈需要从“人类学”的知识宝库中，汲取一些有用的资源，并经过圣经及神学的评鉴后，好大胆地应用在不同的福音处境上。固然，华人圣经学者、神学工作者及宣教学者等都是今天华人教会不可或缺的人才，但沿着刚才我所理解的，是否我们也应有一个合理的推想，就是最好看见华人基督徒人类学者人才辈出，以壮大华人教会的宣教力量呢？

或许出于我太关注这课题的缘故，近年来我发觉我认识多了一些修读人类学的年轻肢体——有男有女；有在本港大学研读的，也有在西方大学学习的；有一些刚准备进入大学一年级，另一些则已经成为博士课程的研究生了。这真是一件美事，为此我感谢神！深愿神在往后的日子兴起更多坚守基督信仰的华人基督徒人类学者。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半年前，我有机会在电话中与一位资深华人牧师交通。当我告诉他我正在中文大学修读人类学时，他不仅没有如其他肢体、同工惯常一样，随即追问我究竟“人类学”是什么，反即时道出共鸣的话，指出人类学对教会使命的重要性，又表达了他对我支持的心声。噢，何等叫人欣慰的话！是的，知音难求；但一旦道出，却总能驱使灵程路上的“孤独者”振作起来。为这次经历，我衷心感谢慈爱主奇妙的带领！

[1]这篇“人类学与宣教”一文原载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院讯》2004年10月号，页7-9，后来较详尽版本则收录于拙著《灵风吹万民——双管齐下的宣教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6年，页190-199。

[2]这篇文章载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出版，《使命教会》第八期，2005年8月号，页20-23。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十二期，2008年四月。

(原文刊于《大使命双月刊》2006年12月号，页5-7。蒙允转载。作者保留本文版权。蒙作者允刊载。)